

序 言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苗人、维吾尔人、壮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中，初步规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政策，把国内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作为党纲的一部分。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民主。”为了宣传贯彻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党还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区开展建党工作。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

湘鄂川黔四省交汇的广大地区，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汉语意为“本地人”。全族总人口570多万（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五峰、长阳两个自治县，重庆市石柱、秀山、酉阳、黔江和贵州省的沿河、印江等自治县。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及松桃、印江等县，湖南省的花垣、凤凰、吉首、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市，湖北省的宣恩县和重庆市的彭水、秀山、黔江、酉阳等县。它是历代先后迁入的兄弟民族，土家族是土著民族。

土家族历史悠久，是古代巴人之后。巴人最早生活在今陕西、甘肃一带。母系社会末期，巴人迁居到今湖北长阳一带。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瞿氏、相氏和郑氏，他们一同生活在湖北长阳县的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巴氏之子务相以投剑于石穴，乃独中之，乘土船，独能浮，为巴族五姓共推为全族首领，尊号“廪君”。率其部落向西开拓。渐由湖北清江流域，扩展到川东的广大地区。曾以“巴方”之名称见于史册。巴与中央王朝接触较早，夏禹会诸侯于会稽时，巴蜀与焉。武王伐纣时，廪君后世孙巴大柵带领一支部队，助周伐纣，在战场上，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因此，周的建立，巴人是有功绩的。故武王克商后，以其宗姓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历史上有名的巴子国，都城在江州（今重庆市）。春秋战国时，巴国连败邓、庸等国，进入了“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强盛时期，一度与楚抗衡。到战国后期，秦的力量逐渐强大，巴、蜀两国经常战争，国势日衰，楚趁机并巴，占据了巴国大片土地，加之巴内部发生内乱，其活动范围急剧减小。公元前 316 年，秦灭亡了巴国，置“巴郡”，秦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并以秦女下嫁巴人首领。巴人作为一个总体开始解体，一部分进入今陕西、甘肃一带；一部分南下进入湘西、黔东北；一部分进入湖北天门、沔阳一带，这部分巴人后被汉化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迁移。他们的子孙同域内其他民族，长期交往，相互融合，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到宋代“土蛮”“土人”“土民”的称呼开始出现，以区别当地的苗人、汉人。土家作为一个民族，此时已经形成。明清时期，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土家”是汉人对其称呼。他们聚居于湘鄂川黔交汇处。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披荆斩棘，开发了这片土地，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苗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古老民族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苗族的先民就活动在长江中游“荆楚”地带，后来，逐步从洞庭湖溯辰江、沅江西上，到

达湘西、黔东地区,后又向黔南、黔西北及鄂西、川东地区迁移。苗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我国长江中游和西南广大山区,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清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的重大政治制度变革后,过去“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封闭禁令被打破,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大批的不断的迁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家族苗族同汉族及白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形成这一地区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仅就湘西、鄂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人口统计:湘西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56.2%,其中桑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86.3%;鄂西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45.1%,其中鹤峰县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51.15%,在少数民族中土家族人口居首位。

土家、苗、白、汉各族人民,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的斗争中,不仅形成了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剥削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邪恶势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比如在清仁宗喜庆初年,川、鄂、陕、甘、豫五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而土家、苗族地区的白莲教是其中规模较大,起义时间较早的一支,曾震撼当时封建统治者。从清同治初年起,土家、苗族地区在酉阳、黔江、长阳、恩施、利川等地此起彼伏的爆发了反对外国传教士、保护民族权益的斗争,显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冒着敌人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批判和纠正了党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战略,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开创了新的局面。继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一师,建立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

党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也建立了湘鄂边、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历时达八年之久。土家、苗、白、汉等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9日党中央在给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信中说:“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即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1月下旬,贺、周抵达湖北监利县反嘴,会合了贺龙的老部下,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返回洪湖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贺锦斋等人,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后,于2月28日贺、周及贺锦斋等人一起回到了贺龙家乡白族聚居区洪家关。在土家、苗、白、汉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出现了一支由贺龙、周逸群率领的工农革命武装,于1929年6月在土家、苗族人民聚居区创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它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第一块红色区域。形成了鹤峰、桑植、石门、五峰、长阳为中心,包括湖南的大庸、慈利、永顺、龙山和湖北的恩施、巴东、建始、宣恩、来凤、咸丰、利川、松滋等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它也是党中央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分区割据的整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赋予了古老的山区以全新的意义。后又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当时几块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根据地之一。1932年夏,蒋介石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内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攻,丧失了洪湖苏区。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被迫远征千余里,转移到湘鄂西根据地的大后方湘鄂边苏区。1933年夏,蒋介石任命湖北军阀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纠集湘、鄂两省十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采取分路向根据地合围。由于红三军分散活动,因此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于1933年12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的大村召开会议,不得不决定放

弃湘鄂西根据地中仅剩的最后一块湘鄂边苏区，向川东转移，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

红三军经过半年的艰苦转战，直到 1934 年 6 月下旬，才在黔东建立了一块根据地。1934 年 10 月红六军团奉中央之命与红二军团（红三军）会师于黔东特区根据地。1934 年下半年和 1935 年，全国红军都在长征、转移，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之下，在土家族、苗族更广阔的聚居区内，创建了近百万人口的湘鄂川黔新苏区，开辟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湖北的宣恩、咸丰、利川，重庆市的黔江、彭水、酉阳、石柱、秀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其游击区更为广阔。成为我国南方最后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树了卓著功勋。这支部队成为我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建国以来，对这两块在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中，有关战史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甚多；而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和它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作用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甚少。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并纠正有关认为这里是丛山峻岭，群众落后，不能巩固和发展苏区；或是在敌人进攻之下，认为苏区有立即消灭的危险等观点，我们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最初的想法。

在本书中，我们不以内容的全面和结构的完整为目标，在写法上力求摆脱面面俱到的模式。主要是在突出“特色”两字上下功夫。既要突出民族特色；也要突出它与其他根据地的不同特点，为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宝库增添一些新内容，同时也还要突出这块根据地的特殊战略地位和其他根据地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此书的重要特点，本书还将《土家族在卫国保疆中的贡献》、《鄂西清代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叶挺将军囚

禁恩施的岁月》等内容作为附录收入，以便读者对土家族的强悍、劲勇、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民族特性，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和民族团结的高尚品格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深信，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英雄的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根据自身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打击敌人，发展工农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率先建立起第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正如1932年5月《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边特区及独立团工作决义》载：“鹤峰、五峰、长阳、石门、桑植，已经存在着几年的苏区和红军，而且苏区曾经扩大到五县以上，当敌人进攻的时候，群众自动的反抗（如长阳），这证明着工农群众的斗争，早已走上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一定会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继承和发扬英烈们的追求真理、为人民献身的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意志；依靠群众、甘苦与共的作风，为土家、苗族地区的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尽快缩小土家族、苗族地区与全国其它民族地区及发达地区的差距，为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开拓前进。放眼过去，立足现实，也是我们写作此书的又一重要出发点。

由于书中所叙之事，涉及诸多事件、人物、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湘鄂边苏区是我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湘鄂边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建立武装割据，是党中央直接决定和领导的。它是党中央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分区割据的整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既可与湘南、湘东相互策应，威逼长沙；而且可以同时造成与鄂豫皖、湘鄂赣相配合以威逼武汉的局势。因此，它在实现当时党中央制定的两湖暴动计划的战略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湘鄂边地区的革命高潮与低潮

湘鄂边地区的革命知识青年，在武汉、长沙、宜昌、沙市和常德等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还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董必武在武汉办的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后被党组织派回到本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 1924 年 1 月，实现了国共合作以后，很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使湘鄂边地区的国民革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 年春，湘西的石首、大庸、桑植、慈利、鄂西的长阳、五峰、巴东、建始、恩施、宣恩、来凤、咸丰、鹤峰各县，相继公开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或县党部筹备委员会。部分县还成立了农民协会、商民协会、青年协会、妇女协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为这些组织的中坚。他们借用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偏僻的湘鄂西山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各地相继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官吏，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为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来凤县共产党员张昌岐在来凤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建始县共

产党员聂冬青(1924 年在北京读书时,由李大钊介绍入党)在建始县举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培训农运骨干 50 多人。不少县还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当时桑植县就发展农民协会会员达 6000 余人,为了保卫胜利成果,有些县、区建立了 1000 余人的农民自卫队。为配合北伐战争,来凤县于 1926 年 10 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近百人,化装进城赶集,杀死白军 2 人,获枪两支,迫使十八混成旅余学忠一连人马离开来凤。这次武装斗争曾得到董必武、陈潭秋的嘉许,并在武汉的《楚光日报》上作了报道。桑植县的农民在县城赶场时,发现了作恶多端的惯匪熊兆祥,刹时聚集数百人,将熊拖到教场坝,用石头将熊砸死。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来凤县的广大群众在北伐军占领武昌后,由共产党员张昌岐主持召开了 3000 多人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接着农民自卫队又活捉了一贯骑在人民头上的本县的大劣绅张又新,召开 1000 人公审大会,处决了他;农民自卫队又攻打团阀李佐卿,李被当场击毙,缴枪 10 余支;逮捕反动县知事(县长)向炳昆。农民革命如急风暴雨,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大革命的洪流一浪高过一浪,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湘鄂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专政,对共产党人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反革命政策。于是,各种反动势力又联合起来,残酷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先是宜昌的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叛变,率军进犯武汉。同时,川军杨森部下,进犯鄂西地区。原倒向革命的恩施驻军李晓炎部(属黔军),此时又倒向蒋介石,叛变革命。5 月 21 日,驻长沙的许克祥叛变。原逃至宜昌、沙市等地的土豪劣绅邓进武、邓子范、陈秀山

等立即带一伙流氓打手回到长阳，以重金收买县警备队，对党部农工学联事会大肆捣毁。捕捉共产党员工友农友学生共 40 余人。施其严刑拷打，游行示众。甚至连累父兄亲属，无不施其残忍暴虐之刑法，以快其心。驻常德的国民党熊振部与常德公安局警察队，包围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当天打死打伤民众 600 余人，仅农会的干部被害的就有 200 余人。来凤县团防大队长李竹五，以巨款收买山内大土匪向卓安和四川兴隆平的团防杨松生等约 1000 余人，500 多支枪，围攻来凤县城，共产党员张昌歧、吴郢堂带领农民自卫军团城抵抗，坚持三天三夜，因叛徒潜开城门，敌人蜂拥而至，张、吴率军突围，退至湖南龙山坚持斗争。因叛徒告密，张昌歧被捕就义。就义时，年仅 27 岁。^①

湘鄂边地区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虽暂遭挫折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种子却在各族人民的心中生出了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党开始转变自己的活动方式，又继续领导人民作更艰苦的斗争。在石门，农民自卫队 200 余人，转移北乡山区活动。长阳党决定：部分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控制的军政机构中，伺机开展革命活动，并决定田进武、田作汉转移到武昌，以一旅馆(明德号)为掩护，作交通联络工作 龚良朋、陈泽南等深入乡村，进行组织发展 胡荣仁、胡荣本到巴东、宜昌、枝江等地，与原宜昌第三师范的革命师生联络，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咸丰的共产党员黄兴武于 1927 年 9 月回到家乡龙潭司进行党的活动，年底又同从武汉学习回家的党员黄子全一起，发动群众，争取“神兵”，伺机组织暴动。

二、湘鄂边区的年关暴动与特色

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1927 年 8 月 1 日

^① 《来凤县革命斗争史简编》1975 年 12 月

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给处在十字路口的革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以枪对枪，义无反顾地踏上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征途。

正当湖南、湖北两省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及时制订了“秋暴计划”，并为组织和发动秋暴而进行紧张工作的时候，8月下旬，党中央作出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①：“决定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以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政权。”并规定：“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动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湖北省委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决定“湖北的暴动……应自鄂南开始（九月十日）。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胁武汉，或由鄂南攻岳州威胁长沙。”据此湖北省委调整和建立了鄂西特委^②，指定宜昌县委书记曹壮父三人组成鄂西特委。特委机关设在宜昌。9月初，省委又决定把江陵区合并于鄂西区，由张计储、张善孚和曹壮父三人组成鄂西特委，机关设江陵，省委又派黄鳌来指导秋暴工作。不久，省委又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特委。公安暴动应造成独立暴动区域，必要时向施鹤一带发展，并派杨维藩到施鹤活动。1927年10月，施鹤地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杨维藩、金裕汉、郑廉、黄子全等人，出席了中共鄂西特委在宜昌召开的党团联系会议。讨论了在鄂西组织武装暴动等问题。鉴于施鹤地处鄂西边陲。交通不便，领导指挥困难，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施鹤临时特委。^③统一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②鄂西特委辖宜昌、当阳、松滋、枝江、远安、宜都、长阳、五峰、秭归、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丰、来凤各县，1927年9月又将江陵区的江陵、公安、石首、荆门等县归属。

③曹壮父《鄂西报告》，1928年8月17日。

领导施鹤七县（不含巴东）的武装暴动。12月底，来凤的杨维藩、恩施的郑廉、金裕汉、咸丰的黄子全、建始的聂冬青、张学敏等人。到咸丰的土家山寨龙潭司召开了施鹤党团联席会议。会议由杨维藩主持。传达鄂西特委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等问题。正式成立了中共施鹤临时特别委员会，杨维藩为书记。到1928年元旦，在龙潭司建立了施鹤农民自卫总队，黄子全任总队长，杨维藩任政委，下辖四个大队，总兵力达300余人，同时成立了青年团、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发动了“开仓济贫”的斗争。1927年9月，中共长阳特支书记龚良朋与鄂西特委取得联系。特委派龚良朋为特派员，恢复发展长阳、五峰两县党的工作。派张国清（北方人）、胡荣仁、陈泽南在长阳组织武装暴动。龚良朋等回县后，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全县党员发展到80多人。在茅坪、流溪、西流溪、龙潭坪、杨拓坪等地建立了5个党支部。1927年11月，中央曾多次对湖北指示：要求“应在极短的时期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①。12月，以郭亮为首的省委号召在城乡实行红色恐怖即是暴动的开始，要求各区的城乡均举行年关暴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荆州两岸年关暴动正当紧张筹备的时刻，贺龙、周逸群于1928年元月到达监利县境与监利、石首、华容、沔阳的中共县委取得了联系，参加和领导荆州两岸的年关斗争。首先在监利沿江乡镇攻打团防据点，镇压土豪劣绅，继而跨江南下华容、石首，最后折回监利下车湾。迅速开创了荆沙两岸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在荆州两岸年关斗争的胜利推动下。湘鄂边地区于1928年元月，胡荣仁、黄维成率200余人进军长阳县城龙舟坪，发动了武装暴动。起义军作战失利，胡荣仁转移，黄维成率余部退到宜昌境内被团防围

① 《中共致两湖省委信》1927年8月15日。

攻,举事失败。2月施鹤临时特委率咸丰农民自卫队,并联合“神兵”王锡九和大坝联英会戴青云的农民武装,攻打咸丰县城。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神兵配合迟缓,孤军作战,农民自卫军受挫,黄子全率100多人突围。转移到宣鹤交界的山地活动,后加入贺龙的部队。1928年3月,巴东党在鄂西特委的指导下,领导神兵武装,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一举攻下了巴东县城,获得了‘杀官夺印’的胜利,建立了鄂西第一个红色县政权——巴东县人民委员会。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规定‘湘西北各县‘分南、华、安一路及常、桃、汉一路,以常德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暴动,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为加强湘西地区的秋收暴动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湘西特委,辖常德、桃源、汉寿、石门、慈利、澧县、临澧、桑植、沅陵、辰溪、溆浦、麻阳等县。特委机关设于常德,在特委的积极活动下,各县加紧恢复党的组织,聚集农民武装,积极准备秋收暴动。10月底,湖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了省委,通过了《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民举行全省第二次大暴动。省委派彭公达前往湘西,在常德的沅山召开湘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组成了湘西特委,彭为书记,并对各地工作作了部署,特委直辖常德、桃源、汉寿、石门、慈利、澧县、临澧等县。湘西北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县,由特委委员陈协平负责。11月下旬,陈协平秘密到桑植洪家关与谷佑箴取得联系,传达了中央、省委和特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陈协平返回常德后,谷佑箴与贺连元、贺炳南等人商议后,到南岔、陈家河等地秘密串联,召集了一些因苛捐杂税而造反的农民武装,组成了一支300多人、100多支枪的农军,聚集于洪家关。接着又与贺英和谷志龙两支地方武装会合,成立了农民起义指挥部。贺连元任总指挥,分东、西、北三路,一举攻下桑植县城。县长陈策勋带余部逃窜,农民占领县城12天,开发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革命斗争。后因陈策勋勾结国民党军队

反扑，农军为保存力量，主动转移乡下，分散活动。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即暴动给省委的信》中指出：湖南全省总暴动“应当以长沙为中心”。同时在湘南、湘西应尽可能形成一个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局面。”根据中央精神，省委作出巩固湘东割据，实现全省总暴动的计划。湘西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拟定以石门、慈利为基础，割据石门，巩固湘西暴动。建立游击武装中心，向外发展，配合湘东割据的计划”^①。并派特委委员张仲平前往石门担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石门年关暴动。石门县委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新关、南岳等地发动群众，化整为零，各自为战。12月30日晚上，龙家泉、张仲平带领暴动队员30多人，包围了石门警察局长上官嗣西的家，打进自治局，杀了“亲爱党”的组织委员廖誉先，处决了挨户团区大队长熊清和；曾庆轩和陈碧谟各带一队人马，分头包围磨岗隘的大豪绅、区团总龚砥臣的家，杀了龚砥臣；陈奇谟、覃苏领导了磨市暴动；唐占益等人在泥市暴动，肖渊泉在福田暴动。搞得土豪劣绅惊恐万状，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连县警察局长上官嗣西不敢在县安身，避逃津市。

这一时期，湘鄂边的农民暴动，虽然规模较小，比较零散，彼此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大都失败了，但是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推动了湖北中西部以及湖南北部各县的武装斗争，同时也锻炼了党组织和党员，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也有其地方特色，为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一，这些暴动不仅有广泛的农民参加，而且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做好争取土著武装和“神兵”的工作，以筹集武器，扩大暴动武装力量。湖北省委明确指示巴东党组织：对“神兵”等农民武装组织，可以受我们指挥者，应派同志去做党的政治工作；并加以改编

^①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0页。

成为工农革命军^①。因此,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陆续派人加入到巴东、兴山等县的“神兵”中去,很快发展了一支“神兵”队伍。他们在神兵中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下层“神兵”的阶级觉悟,并在“神兵”中发展党组织。中共施鹤临时特委在咸丰龙潭司成立后,为发动武装暴动,以青年协进社的名义联络了黑洞神兵领袖王锡九,商议联合攻打咸丰县城,龙潭司暴动失败后,特委书记杨维藩打入咸丰黑洞神兵。特委委员黄子全等人到鹤峰、宣恩边界,联络乾文统的“联英会”神兵,特委委员金裕汉到利川汪营联络神兵,分头发动,准备再起,实际上,许多“神兵”组织到1927年下半年,已成为掩护党活动的阵地。有的发展成为党掌握的武装游击队。同时,也注意了争取土著武装的工作。在桑植农民自卫队就是联络了土著武装,一举攻下县城,赶跑了伪县长。

第二,在年关暴动顺利发展中,注意了迅速建立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暴动成果。从政权的组织形式看,可分成两种:一是以农民自卫队的武装组织及其领导层为核心,建立农民协会,代行政权。他们还成立了共青团、妇女会等群团组织。二是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比如在巴东县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张华甫任委员长、黄大鹏任公安局长。人民委员会下设军事、民政、盐务、粮食、教育、宣传等科(股),掌握了全县的行政、司法、立法权力。还公布保护长江航运和其它商业的正当营业,废除盐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和欢迎,这是建设红色政权的一次伟大实践,为以后创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营垒,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武装。1927年7月,黔军四十三军开驻长阳,军长李晓炎委参军龚勋南代理长阳县长。长阳中共党员李勋、李子俊和龚均是同学

^① 《湖北省各县工作议案》1928年2月10日。

与旧交、李勋即与龚联系，由龚介绍李勋到四十三军作后勤组织工作，同时龚又委李子俊为临时‘清乡’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李勋在协助新派任的县长邓先奎督导‘清乡’时，李勋约龚良朋、陈泽南、李步云等20多名党的骨干在他家中集会，决定以“灰色面孔”出面，派一批党员打入各级‘清乡’委员会和团防中去，并利用反动政府允许地主自办武装的时机，顺势发展工农武装，以控制‘清乡’运动，壮大革命力量。5月，长阳县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邓先奎任委员长，委员李勋、李子俊、田玉龙、邓宗模等九人^①。从此，李勋以‘清乡’督导的身份，到全县各区以组织团防开展‘清乡’为名发展游击武装。同时，指挥各区团防搜捕与土匪勾结的地痞流氓，解县镇处。中共流溪党支部陈泽南，利用党员向建东任“保董”地位，以‘防匪保家’为名，组织了30余人的农民武装——人民自卫团，支部书记陈兴垣任团长，党员陈子清任大队长，陈泽南还亲自到宜昌购步枪18支、短枪两支，制作统一服装40多套，武装了自卫团，使这支农民武装很快发展到70余人。都镇湾李俊川、李步云、江梦雄等共产党员，以训练团防为名，组织了30多人的游击武装。到7月底止，据鄂西特委报告记：“长阳游击战争已经发动。”“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参加行动的有1000人”^②。

“八·七”会议以后，在酝酿发动年关暴动过程中，他们能从实际出发，选择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和离城镇较远的农村，在那里发动群众、积聚力量，组织农民革命武装，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深入敌人营垒，控制敌人的武装力量，争取团结“神兵”和土著武装的力量。因此取得了一些暴动的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向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为积蓄革命力量，为后来革命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

^① 《湖北清乡旬刊》第13期，民国27年2月1日。

^② 曹壮父《鄂西报告》1928年8月17日。

三、桑植暴动到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2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派贺龙、周逸群同志返湘工作,组建以郭亮为书记,贺龙、周逸群等为委员的中共湘西北特委,发动和领导湘鄂边区的武装斗争。1月15日,周、贺偕卢冬生、施元(即史书元)等10余人到达武汉,到汉后,因情况变化,郭亮另有任务。1月20日,周、贺等10余人抵达监利观音洲,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此时特委委员仅贺龙、周逸群2人,仍以特委名义工作,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攻打监利失败后,中共鄂西南特委决定依据山林、湖泊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贺、周偕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等按中共中央原定计划转往湘西北发动武装暴动。并约定分片发展,日后在松滋、公安一带会师。于2月28日到达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贺龙、周逸群一方面凭着他们的声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发动穷苦农民,收编土著武装,很快组织起3000多人的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司令,接着湘西北特委组建了以李良耀为书记的中共桑植县委。4月初一举攻克桑植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派出得力干部联络湘鄂边各地党的组织,以发展党员,动员群众,创建革命武装,相互策应。派张海涛(黄埔生,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叛党)到石门,委任为石门县委代理书记,要他与原县委(正值石门惨案期间,县委遭破坏)取得联系,就地领导武装斗争,迅速开辟石门与松滋的交通线;派李良耀到鹤峰,协助鹤峰党发展组织,壮大力量,到鄖阳关神兵中去开展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派陈寿山(石门人,曾参加南昌起义)到长阳发动武装暴动,策应桑植的工农革命军,并确定长阳党在五峰渔洋关设联络站,以打通长、五、石、桑的交通线。从此,湘鄂边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迅速活跃起来。

桑植暴动首战告捷,国民党反动派立即纠集军队向工农革命军反扑。4月初,趁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之机,遭黔军四十三军龙毓仁旅的袭击,连战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返回石首后,

重建鄂西特委)失去联系。余部由贺龙带领撤到湖北鹤峰县的红土坪休整。5月部队又发展到400多人。6月,工农革命军出击桑植县的洪家关,又遭桑植团防围攻,战斗失败,再次退到鹤峰七朗坪一带。贺龙决定,一面派卢冬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一方面主要负责人分头活动,收集失散部队,筹集粮饷。此时湘西特委派来的特委委员陈协平与贺龙相会。根据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合并为湘西特委,成立了由贺龙、贺锦斋、陈协平、张一鸣和李良耀组成的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为书记。管辖工农革命军及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接着,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部队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和工农革命军连遭两起两落的教训。决定(一)改造旧部队,加强对下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军事训练,吸收进步士兵入党;(二)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三)准备东进石门,支援石门南乡暴动,扩大游击战争。这次整军,发展士兵党员40人,大队以上均设党代表,部队扩大到1500多人。8月,贺龙率部东进石门,途中得知南乡暴动失败,前委决定移师石门北乡仙阳,遭湘敌十四军突袭,参谋长黄鳌牺牲。10月在石门丝毛岭战斗再次失利,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仅存100余人。于10月第三次退到湖北鹤峰的梅坪堰垭地区,湘西军阀陈渠珍派江文周团尾追,复遭湘鄂两敌合围,转战于红土坪、七郎坪、茶园、桑木坪一带,与敌周旋于深山峡谷。工农革命军在群众的掩护下,化整为零,日必数迁,夜夜转移,日不归屋,夜不成寐,全体官兵,同甘共苦,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敌军“进剿”月余,以失败告终。此时,湘西前委收到10月4日邓小平批示交通员送来的中央指示信。信中就游击战争的任务、方针及前途等问题作了指示。正处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的贺龙和全军指挥员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真若久旱逢甘雨,全军上下欢腾雀跃,前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抓住战闲时机,在堰垭对部队进行整顿,全军只剩91人,72支枪,部